

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書評

施仲謀、蔡思行編著：《香港中華文化教育》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9月。總321頁。

陳曙光

一、引言

「文化」一詞，最早可溯源至《易經·賁卦》：「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代劉向《說苑》云：「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都強調人文教化的作用。19世紀末，日本以「文化」逐譯西方“Culture”一詞，其後傳至中國，成為現代通用詞語。根據《現代漢語辭典》，文化的定義是「文化指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頁1371-1372）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雖已歷數千年，但憑着強大的生命力，至今仍影響着全球華人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以至思想行為。隨着中國崛起，中華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力亦與日俱增。

語言和文化有密切關係，要認識一個地方的文化，必先從學習語言着手。王宗炎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傳授和傳播必然借助於語言。」（王宗炎，1999，頁54）

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大部分家庭日常均使用粵語和中文溝通，但由於受百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導致中文教育長期不受重視。本書作者一針見血：「學生學習中文，只有抽象的文化教育功能；學好英語，卻有實際的市場價值。因此長期以來，香港社會普遍重英文輕中文，學生中文水平較低。」（頁 1）學習母語認識自己國家文化是理所當然的事，在香港卻成了例外。殖民地時代長期重視語文的工具性和實用性，以致把語言所盛載的文化意涵、品德情意排除在外。《中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學發展簡介》明確指出「中文教學主要目標為訓練學生表情達意能力及培養學生閱讀理解及思考。德育訓練及常識之獲得，並非主要工作。」（頁 4）這種取向普遍受到學者的批評，如李家樹認為「母語（中文）教學如果不與本國文化教育結合起來，僅僅強調其工具性，就根本連第二語文教學的程度也攀不上。」（頁 49）1992 年，中學預科開始推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2000 年教育改革課程指引，把「中華文化」列作中國語文九大學習範疇之一，令文化教育漸受重視。目前，香港的中華文化教育尚在發展階段，施仲謀教授、蔡思行博士合著的《香港中華文化教育》正可全面總結經驗，反思過往學校以及民間推廣文化教育的優劣，並為香港未來的文化教育訂定方向。對前線教學同工或香港文化教育有興趣的市民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材料。

二、內容簡介

本書共有六個部分，「緒論」除了介紹香港「兩文三語」的獨特語文環境和中小學語文教育困境外，作者更關注普通話教學以及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況。第一章梳理自香港開埠以來，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變遷；中華文化學習內容及與中國語文教育之關係，並從校訓角度分析中小學文化教育的實踐。第二章以施仲謀研究團隊於 2003 年至 2011 年間獲得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四次教學研究項目為例，全面探討中小學中華文化教育的創新實驗與發展方向。第三章聚焦香港各大專院校如何透過研究與教學，弘揚中華文化。第四章則把視野擴

展至民間，介紹包括儒、釋、道文化機構以至其他民間團體對於香港中華文化教育的貢獻。最後一章為「跋語」，展望香港中華文化教育的發展。作者深具國際視野，提出除了顧及本地需要外，中華文化教育應擴展至各地華人以至全球中華文化愛好者。

三、本書特色

(一) 綱目清晰，內容全面

研究香港語文教育的專著不少，但多集中從學習語文角度分析香港教育政策的發展，如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1996)；梁慧敏、李楚成的《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2019)等。本書聚焦中華文化教育，正可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中文教育和文化教育密不可分，這是語言教學的主流和共識，也是作者的立足點。在香港，中文教育長期被邊緣化，自1842年成為殖民地後，英語一直是香港唯一的官方法定語言，直至1974年，中文雖獲得官方承認，成為另一法定語言，但香港社會「重英輕中」的思想卻從未動搖，政府文書、法律文件仍以英文為主。回歸後，香港政府曾銳意推行「母語教學」，要求中學必須運用粵語作為日常授課語言，但同時又允許114所中學以英語授課，令這些中學成為特權階級。結果「母語教學」遭受社會人士和家長大力反對和非議，政府其後又推出「微調」政策，容許學校在符合條件下轉為英文中學，又容許不同班級採用不同教學語言，再次強化英文在教育的地位，使「母語教學」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教育政策一直以實用性為主，「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更着重的是所謂『實用中文』，即求識信、投訴信、公函、新聞稿等『實用文』寫作的訓練。」(頁3)1992年推行「預科中國語言及文化科」亦只設「實用文」而不設「作文」。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推廣中華文化可謂舉步維艱。本書有系統整理香港的中華文化教育，從十九世紀私塾直至本世紀課程改革和其他文化教育實驗；內容則涵蓋正規中小學及大專課程、民間課程和講

座等，令讀者全面了解不同年代學者及賢達的努力。本書提出中文教育的不同論題以及與文化教育之關係，都值得中文教育工作者深思。現分點臚列如下：

(1) 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分科

1974年，「香港中學畢業會考」（為英文中學而設）與「香港中文中學畢業會考」合併，成為「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畢業會考」原只設「中國語文及文學科」，後分拆為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兩科。本書概述分科經過，提及當時不少前線老師支持決定，認為語文是溝通工具，是學文化的基礎，而文學則是少數人的事，而道德思想教育則各科老師都有責任。（頁47）這種把語文、文學、文化割裂的主張受到學者普遍的批評，如何世明認為「會降低中文科水平，導致中學生忽略中國文化的學習」；（頁45）蘇文擢認為「中國文學蘊含着豐富的文化特質而予讀者以性情品格上深厚的感染，中國文學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頁46）可惜當時政府並未正視這些意見。分科以後，似乎只有文學科肩負弘揚中國文學及文化的責任，1986年《中國文學科課程綱要》便提出教學目標是「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以及「使學生藉本科的學習，收陶冶性情、美化人格的效果。」（頁37）而中文科則只着重培養聽說讀寫等能力。至1990年，政府才把文化、品德情意納入中文科學習目標，又於1992年設立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糾正過錯，然而成效卻有限。（詳下一小節）中文、文學分科是香港中文教育史上的大事，一直沿用至今。2006年開始推行「三三四」學制，中文、文學在課程規劃上均屬於「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根據課程大綱及教學內容，兩科實有不少重疊之處。《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中文指引）提到「文學學習是語文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文學的學習，可以感受語文的美感，從作品的情意中感應人與人，以至人與物之間的真、善、美」；（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b，頁13）文學課程則是「讓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課程的基礎上」，進一步培養文學鑑賞能力以及學習文學知識。（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a，頁9）而兩科

的課程理念都提及「承傳／弘揚民族文化」。

若細心研究文憑試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的題目，不難發現兩者的考核重點有不少相近之處，考問形式亦相似。尤其中文科重設範文後，兩者的差異進一步收窄，如 2018 年中國語文卷一問及〈青玉案〉作者抒述什麼情懷以及如何抒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就是文學性極高的題目。唐秀玲指出讓理科學生修讀語文科；文科學生兼讀中文及文學兩科，本身缺乏學理根據。（頁 45）英語科分為「英國語文」及「英國文學」兩科，這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方法。香港人學習英語是為了提升競爭力，而非深入了解英國文化。香港既不具語境，亦無需全面推行英國文學教育，分科安排合理。母語教學卻不適合相同分類方法，蘇文擢指出「當局 15 年來先把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德育，排除於中文教學之外；再將語文、文學強行分割，語文課程，虛應故事。文學則力求廣泛高深，作為選修科，巧妙地逼使教者和學者自動放棄，於是中文純工具化，而變質為中國人之第二語。」（頁 4）評論可謂中肯。分科的結果卻是令中文教學更趨實用化、功利化，無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語文水平。本書指出「這種迷信語文工具論的教學方法，正是學生越來越厭惡中文學習，致使中文水平每下愈況的根本原因。」（頁 49）目前中文科學習重點繁多，師生無可避免地把重點放在聽說讀寫等能力上，但香港學生學習中文科的動機越來越低，文憑試中文科更有「死亡之卷」之稱，考生的普遍水平令人慘不忍睹；修讀文學科的學生則逐年遞減，學子未能從語文領略中國文學之美、中華文化之價值，他們成為無根的一代，不會以中華民族而自豪。故此，中文、文學是否應重新合併，實在值得教育當局深思和研究。

（2）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設立和取消

早期殖民地政府並不重視中文教育，更遑論願意推廣中華文化。直至九十年代，《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才開宗明義提到要「借着本科的教學，啟發學生的思想，培養學生的品德，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頁 54）1992 年，政府在預科開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作為必修科，學生必須取

得及格成績才能入讀政府資助大學。其中設有「文化卷」，學生須研習六篇文化篇章，包括：

唐君毅：《與青年談中國文化》

殷海光：《人生的意義》

吳森：《情與中國文化》

金耀基：《中國傳統社會》

毛子水：《中國科學思想》（後改為劉君燦：《傳統科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韋政通：《中國藝術精神》（後改為趙永新：《中國藝術的基本精神》）

指定篇章涵蓋哲學、社會、科技、藝術等範疇，有系統地介紹傳統文化。然而考核範圍並不限於此六篇，題目要求學生靈活運用課堂所學的文化概念，評論特定事件或價值觀，並反思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意義。文化科的出現，填補了數十年預科甚至中學課程的空白。然而，本書指出學與教的兩項弊處：一、由於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對中華文化認識不多，難以理解理論性強的文章；二、老師的文化水平不一，令教學成效不顯著。（頁 149）加上文化科只屬於「高級補充程度」，無論教學時數與學生的重視程度均不及「高級程度」科目。不少理科生更視為畏途，欠缺學習動機，只求取得及格以換取大學入場券。

隨着新高中課程的推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於 2012 年正式取消。新高中不再獨立設「文化卷」，不少前線老師對此深表可惜，認為令學生失去有系統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另設 10 個選修單元，其中「小說與文化」及「文化專題探討」均與中國文化有關，不少學校亦會在「文化專題探討」單元教授《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社會》的部分概念，如「五倫」、「差序格局」等，深化學生的理解。由於只屬選修單元，學生學習動機更為低落。失去了統一課程及教材，老師也可能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設計單元，令教學更見困難。坊間的教材亦良莠不齊，無法滿足教學需求，可見編寫優質的中華文化教材實屬必要。

本書第二章介紹施仲謀研究團隊的中華文化教學實驗正回應前線

需要，團隊敏銳地發現「初小中文課本的編撰，雖已滲入中華文化的元素，但欠缺較為系統的編排；相關的網上資源，總體給人以零散的印象，缺少較全面的規劃」；（頁 101）「針對廣大初中程度學生並配合中國語文新課程綱要的文化讀物，卻尚未見」；（頁 129）「高中階段的中華文化教育，是個全新的領域，坊間尚未見有符合現行文化教學核心宗旨『認識 → 反思 → 認同』的參考讀物。」（頁 150）四次計劃全面覆蓋中小學十二年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邀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地的專家學者及本港學者和老師，共同制訂不同學習階段中華文化學習大綱。不同階段學習大綱各有重點，改善目前文化教材零散之弊，有助老師有系統地教授中國文化；同時配合中小學生知識水平和興趣，令他們有自學的動力。朗讀在語文教學的效用甚大，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表達及思維能力，故小學重視透過朗讀吸收中華文化的精粹；初中開始着重介紹文化知識，引導學生進入反思和認同的層次；至高中則重在探究文化的核心精神，並帶領學生進入反思和辯論的層次。其次，各計劃亦為所選對象編訂深淺適中的教材，並邀請中小學進行教學實驗，收集老師及學生的意見後再作修訂。實驗完成後，團隊把教材彙編成《中華經典啟蒙》（初小）、《中華經典導讀》（高小）、《中華文化承傳》（初中）、《中華文化擷英》（高中）等書籍，贈予各中小學及圖書館，為老師提供優秀教材；並製作網上數據庫，供有興趣人士參考。此外，研究實驗計劃定期出版《文化通訊》、舉辦講座、工作坊、朗讀或作文比賽以至文化考察活動，讓學生在課餘時間亦可接觸和了解中華文化。計劃既得到本地學界支持和參與，亦獲學術界推許和好評。實驗計劃的教材陸續推出簡化字版，以利全球華人學習中華文化。（頁 148）而《中華文化承傳》更獲選為「全國青少年百種優秀圖書」之一。（頁 200）實驗計劃填補了文化科取消後的空白，更把中華文化教育擴展至初中及小學。

(3) 「普教中」與「粵教中」

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並不重視普通話教學，加上粵語本來就是強勢方言，故一直成為香港中文中學及大部分小學的主要授課語言。

以方言而非共同語作為學習中文的媒介，在華人地區非常罕見，既不利香港學生掌握書面語，亦阻礙他們與中國人民交流溝通。近年，祖國經濟日益蓬勃，若香港學生普通話水平欠佳，難免會被邊緣化。回歸後，政府致力推廣普通話，越來越多小學以及初中運用普通話教授中文。近年，政治形勢日趨複雜，本來純粹討論教學成效的語言問題亦蒙上政治陰影，對香港語文教學發展實非幸事。對於「普教中」與「粵教中」之爭，不少學者曾進行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亦莫衷一是。本書在敘述相關問題時提出以普通話學習有助了解中華文化的新視角，曹順祥指出「透過普通話學習，我們能夠更深刻理解歷史、理解中華民族。」黃國慶亦提出普通話教學如果脫離文化教育，便不是完整的教學。（頁 50）事實上，學習普通話不單有助掌握現代漢語的詞彙和語法，亦有助學子認識祖國歷史、風土人情；透過朗誦更有助學生理解中華文化的內涵和精粹。教育當局須及早制訂長遠政策，落實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目標，並結合文化教育，令學生能從誦讀到認識，進一步認同中國文化，培養歸屬感及民族自豪感。

（4）非華語學生學習中華文化

理性、多元、包容一直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香港雖然是以華人為主的單一種族社會，但少數族裔數目近年有上升的趨勢。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少數族裔約有 58 萬人，佔香港人口的 8%。（民政事務處種族關係組）其中不少兒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父母亦是香港永久居民，視香港為他們的家。協助少數族群融入主流社會，是政府行之已久的政策。然而，語言隔閡卻成為融入社會的最大障礙。少數族裔人士不乏能操流利英語者，但學習中文對他們而言卻是很大挑戰。若他們中文未能達到一定水平，便不容易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無法改善生活，只能成為永遠的「他者」，無法融入香港的主流社會。2014／15 學年開始，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容許非華語高中學生修讀「應用中文」課程以代替文憑試中文科的成績，對他們升學及就業有一定幫助。但與鄰近的地區比較，香港的第二語言教學起步較遲，本書指出教育局

須盡快為南亞族裔制訂第二語言課程綱要，並加強第二語言的師資培訓。(頁 10) 非華語的中華文化教育方面，目前教育局提供不少津貼，如「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和「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的非經常性津貼」等。這些只是一筆過津貼，且以校本為單位，欠缺中央統籌，成效有限。教育局應研究完善的推廣中國歷史及文化政策。制定政策不是要把中華文化或價值觀強加諸少數族裔身上，而是透過平等、互信的態度，讓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彼此認識、尊重他人獨特的文化和價值，協助少數族裔成為真正的「我者」。

(5) 大學國文與文化教育

對於香港「大學國文」教育，本書同樣有詳盡的介紹和分析。總體而言，大學國文的定位同樣由重視文化傳承逐漸走向實用。最早期的「大學國文」課程可說是中學課程的延續和進深版本。如香港中文大學選用國立編譯館的《大學國文選》，大部分是中國古代名篇，盛載文學及文化的精華。70 年代開始，學界對於大學國文應着重文化傳承還是語文訓練，持續有論爭，但從本書列舉的教材篇目，包括香港浸會學院《大學文選析義》(1972)、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國文講義》(1973) 及《大一國文教材》(1980)，仍以文學名篇和文化論著為主。90 年代以降，大學中文逐漸趨向實用語文教學，例如語法、修辭、錯別字和實用文等，昔日文學、文化元素逐漸消褪。大學英語教學有清晰定位，一方面重視學術寫作訓練，讓學生熟習論文格式、用語，協助他們完成本科撰寫論文的要求；另一方面着重實用英語，方便學生畢業後投身社會。相比之下，大學國文則顯得進退失據，本書指出「即使 1997 年香港回歸前後，不少大學都增強了文化素質教育，但大學語文教學仍無可避免地趨向功能化的發展方向。」(頁 221) 若只從語文功能性出發，追求實用，大學國文的定位便會非常尷尬。經過 12 年的語文教育以及公開試考核後，大學生的母語理應到達一定水平，故此「大學國文」課程不宜只作語文訓練，而應就不同學系的特點加入傳統中國文化元素。目前，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國文」仍以實用中文為主，但要求學生按所屬學院修習相關的古文經典，如醫學院學

生研讀《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商學院研讀《史記·貨殖列傳》、〈論貴粟疏〉等。結合語文及文化，讓學生在本科學術訓練的同時，思考傳統文化的利弊，達致從反思到認同的目標，這種教育方向值得繼續探索。

（二）資料翔實，考證嚴謹

本書與香港中文教育史是相輔相成的著作，所需要處理的資料繁多而蕪雜。難得的是，在論述重要課題時，本書都能提供翔實的資料以及令人信服考證，對有志認識香港文化以至中文教育人士而言有莫大裨益。

（1）範文教學

範文教學一直是香港中文教學的重點授課方式。學生透過朗讀、背誦優秀作品，有助提升閱讀和寫作能力。香港的範文教學經歷了數個階段，香港教育司署在 1956 年頒佈《香港中文中學中文教材》及《香港英文中學中文教材》，以適應當時中英文中學學生中文水平參差的問題。1960-90 年代，中學會考設有指定範文，其中範文的數目和內容經過數次修訂。1991 開始學生需誦習 26 課範文，文言、白話數目參半。2005 年，教育統籌局推行新會考中文課程，正式取消指定範文，盼改變學生背誦標準答案的弊病。當時受到很多前線教師和專家學者的質疑。局方強調「中國語文課程從來沒有取消範文學習，反之，新高中課程配合課程目標精選 300 篇古今文質兼美的範文，供高中語文教師選用，讓學生涉獵更多優秀作品，以拓寬學與教的空間。」（教育局，2013）但推行十年後，由於學生中文水平日益下降，教育局於高中重設十二篇古典散文及詩詞作為指定範文（詩、詞各選三首，故實際為十六篇），並要求考生熟記精華片段。

本書第一章在梳理範文教學的嬗變時，整理了大量課程文件、教科書篇目，現條例如下：

1. 《香港中文中學中文教材》（第一級至第六級第一年），香港教育司署，1957 年。

2. 《香港英文中學中文教材》（第一級至第六級第二年），香港教育司署，1957年。
3. 《中學國文》（第七至九冊），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1961年6月初版。
4. 《國文教科書》（新制中學）（第七至九冊），香港文化服務社，1961年9月初版。
5. 《國文》（英文中學適用）（第七至十冊），香港文化服務社，1967年5月修訂版。
6. 《中文課本》（會考版，中英文中學適用）（上下冊），香港書業有限公司，1971年1月。
7. 《國文》（英文中學適用）（第七至十冊），香港文化服務社，1972年6月新版。
8. 《國文》（中學適用）（第七至十冊），啟德圖書有限公司，1974年版。
9. 《新編中國語文》（第七至八冊）（中英文中學適用），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1月初版。
10. 《中國語文課本》（第七至十冊），上海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版。
11. 1974-1977年中學中國文學科指定範文
12. 1978-1990年中學中國文學科指定範文
13. 1990年中國文學科指定範文
14. 2002年中六中國文學科指定範文

作者更關心範文與文化教育之關係，故又附有「香港初中中國語文科與儒家思想相關範文表」以及根據2015年《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小一至中六）》諮詢文件整理「對中華文化反思的單元篇目表」等。

(2) 香港大學早期中文教學

本書雖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的文化教育為主，但並沒有忽略

香港早期教育史。二戰以前，香港中小學的中文教育不受重視，只有私塾仍以《三字經》等作為童蒙教材。相反，作為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卻早於 1913 年成立文學院並開設中文部，聘請賴際熙及區大典任教，為學生提供古典文史選修科目。1927 年，中文學院以學系形式獨立開辦中文系及語言培訓所課程，是香港早期中文教學的重要里程碑。本書以林愷欣的博士論文《從政治退隱到文化抗逆：港澳兩地清遺民的文化志業研究》（香港大學，2014）為基礎，考察賴際熙對香港大學早期中文及文化教育的貢獻。賴氏為清末翰林學士，且深得華人士紳及商人的敬重，曾任「崇正總會」會長十三年。賴氏積極聯絡各地華僑，曾籌募四萬元捐款，使中文學院得以順利開辦；他亦親撰《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及《香港大學文科華文部規劃書》，作為中文系課程框架。根據學者研究，課程由經學、史學、哲學、文詞以及翻譯五部分組成。此外，賴際熙和區大典運用他們在文教界的地位，延攬在港前清遺民擔任中文學院及中學老師。本書亦介紹當時的教材和講義，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史學課本》一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講義》十二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講義》等等，從講義內容可見設計者重視傳統文化的方針。本節總結時，作者提出「他們遵照前規，教授經典學術，固守傳統，未有跟從國內新興的教材教法，亦未有全面順應港大校方實用的發展要求。賴太史等人的擇善固執，實屬難能可貴！」（頁 172-182）筆者研讀這段歷史，深深佩服賴氏等前輩的毅力和勇氣。他們的事跡和精神仍鼓勵着今天有志弘揚國學的人士。

（三）論點新穎，見解獨到

研究香港教育史的專著，大都把討論焦點放在不同年級的課程上。本書除了處理正規課程外，更另闢蹊徑，從中小學校訓、文化教育與現代社會關係等方面分析。

（1）中小學校訓

「津貼學校」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大部分學校均由辦學團

體創辦及管理，教職員的薪酬和經常開支由政府負責，但日常運作則由教學團體管理。香港的辦學團體多元化，既有宗教組織，如「中華基督教會」、「佛聯會」等；有慈善團體如保良局、東華三院等；也有同鄉會或商會等組織，如順德聯誼總會、五邑工商總會等。香港的中小學大多設有校訓，代表學校的辦學宗旨以及對學生的期望，即使官立學校也有不同校訓，部分團體則統一校訓，如保良局屬校的校訓均為「愛敬勤誠」。

各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不同，也反映在屬校校訓中。本書詳細考察各中小學的校訓，並整理了「儒家文獻校訓分析表」、「香港佛教學校校訓分析表」、「源自《聖經》校訓分析表」等，發現當中與儒家文化有關的有 562 條，佔全港中小學的 51.28%，來源散見於《論語》、《孟子》、《周易》以至宋明理學家的學說等，內容或是儒家對學習的要求，如順德聯誼總會屬下各中小學及幼稚園均以「文行忠信」（《論語》）為校訓；或為儒家提倡的價值，如三所裘錦秋中學校訓為「自強不息」（《周易》）。佛教學校的校訓大多源自佛經，如明智顯悲、明心見性等。天主教、基督教團體在香港辦學非常成功，屬校校訓既有來自《聖經》的教導，如真光學校的校訓為「爾乃世之光」（馬太福音）；也有概括基督教教義，如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的校訓均有「榮神益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天主教、基督教學校校訓均帶有儒家思想，如喇沙書院為「克己復禮」（《論語》）、聖言中學為「克明峻德」（《尚書》）。可見東海西海的價值觀和理想並無衝突。至於大專院校，絕大部分校訓均與儒家思想有關，如香港大學為「明德格物」（〈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為「博文約禮」（《論語》）（轄下九所書院校訓均見於儒家經典）、香港恒生大學為「博學篤行」（〈中庸〉）等。可見辦學團體對於儒家理想人格的嚮往，也可印證中華文化對香港教育的重要性。

（2）文化教育與現代社會

本港不少大學設有專門研究中華文化的中心，如香港大學設「饒宗頤學術館」、香港中文大學設「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學設

「香港孔子學院」、香港教育大學設「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等，加上各大學的中文系、哲學系、文化系的研究，成果豐碩。不過，學術研究成果應轉化為公眾容易理解的知識，方有利於文化教育的普及。其中香港教育大學致力弘揚中華文化，例如舉辦古典詩文朗誦比賽、微電影創作比賽等等。值得一提是當中兩項實驗計劃：1. 「《論語》與現代社會教學實驗計劃」擷取《論語》精粹，編製成 12 單元教材，邀請 17 所中學老師任教，並把教材編成《論語與現代社會》；2. 「《三字經》與現代社會教學實驗計劃」則把《三字經》內容分為八大單元，編製成教材，邀請 28 所小學老師在課堂施教，又編成《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兩項計劃又舉辦工作坊、文化講座、生活營等，讓學生有機會反思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頁 200-206）而所編製教材亦為普羅大眾提供認識中華文化的踏腳石。其他大專院校亦積極舉辦文化活動，如由錢穆創辦的「新亞研究所」除了提供碩士和博士課程外，亦舉辦綜合文化課程，供社會人士修讀，包括「古琴與中國文化」、「國史通識」等。研究所亦定期開辦「誠明講堂」和「夢周中國文化講座」等，以饗中華文化愛好者。本書亦另闢專章記述民間團體的文化活動，分為私塾、儒家、佛家、道家以及其他機構五節，如學海書樓、孔教學院、志蓮淨苑、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以至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等均在不同領域宣揚中華文化。民間團體眾多，本書亦盡力囊括，並悉心整理它們開辦的課程和講座，讓讀者得悉其貢獻。未來，政府應協調官方、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的角色，妥善分配資源，以利中華文化的普及。

四、未盡完善之處

本書的內容橫跨超過一個世紀，體大思精。惟細節仍有小疵，其中最明顯在大專教育部分。書中對香港中文大學着墨較少，僅簡述大學成立經過、中文系、文化研究所、文物館以及法國遠東學院香港中心的情況。然而，中文大學是香港文化教育的重鎮，特別是由錢穆、唐君毅諸位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以「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

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以「誠明」為校訓，以「孔子問禮於老子」畫像為校徽，提倡「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精神。創校初期，新亞書院在深永埗桂林街租用校舍，物質條件極為匱乏，教授薪酬微薄，而不少學生更在學校天台露宿。校長錢穆奔走各地，積極籌集資金支持學校運作，又勤於筆耕，以稿費補助書院。（新亞書院網頁）早期新亞書院雲集不少海內碩儒，如錢穆是著名歷史學者，著有《先秦諸子繫年》、《劉向歆父子年譜》、《國史大綱》等；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都是新儒家代表人物，唐氏著有《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等；牟氏著有《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等；徐氏著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等。除了著述和舉辦正規文史哲課程，新亞書院也舉辦公開文化講座。由賴際熙、區大典等為代表的前清遺老是第一批推動香港文化教育的學者，錢、唐等為逃避戰亂而南來香港的學者則為第二代，弘揚國學，薪火相傳。本書未有詳述他們的貢獻，實屬可惜。

其次，部分章節安排亦有可商之處，如第二章以介紹四次實驗教學為主，卻只有第二節「高小實驗計劃」有結語，與其他章節體例不合。蓋按時序是初中、高中教學實驗先行，完成後才進行小學實驗；而編輯本書時則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編排。若能把結語移到最後一節，綜合各次實驗成果、坊間及學者的評價，編排將更為緊湊。

五、結語：立足香港，面向世界

承傳和弘揚中華文化，是每位中國人應有之義。近年，中國發展一日千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不少外國大學設有東亞語言學系，學者傾力研究「漢學」，但始終只是學術界之事，難以推廣至普羅大眾。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大學開設孔子學院或開辦中文課程。學院雖冠以「孔子」之名，但大多集中教授普通話和中文。學習中文只是第一步，外國人若不進一步認識中華文化，便無法真正理解中國，而文化隔閡往往造成誤會和猜忌。在推廣中國文化方面，同為華人社

會的香港可謂得天獨厚，一方面鄰近中國，容易獲取資訊；另一方面作為國際城市，外國人較容易透過香港認識中國。過往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雖有眾多熱心人士努力推廣，效果仍未如理想。展望未來，香港應該制訂文化教育政策，從幼稚園到大學，有系統地教授中華文化，由最基本的節日、風俗到高階的宗教、哲學等；並做好本地的非華語文化教學。香港也應利用國際城市的優勢，成為中外文化溝通的橋樑，大力推動中華文化教育國際化，如撰寫英文教材、聯同各地大學舉辦國際研討會和交流計劃等，令更多海外華僑及外國人認識中華文化。

參考文獻

-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 (a) (2015)《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載於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 (b) (2015)《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載於：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it%20CA%20Guide_2015.pdf。
- 民政事務處種族關係組 (2018) 人口統計：少數族裔。載於：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info/info_dem.html。
- 王宗炎 (1999)《語言學和語言的應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8)《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香港教育局 (2013)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檢視。載於：<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cleartheair/20130402.html>。
-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2020) 書院介紹，載於 <http://www.na.cuhk.edu.hk/zh-hk/aboutnewasia-zhkh/history-zhkh.aspx>。
- 姚素珍 (2005) 香港中學中國文學課程反思與展望，《香港教師中心學報》，(4) 期，131-14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7)《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